



世纪前沿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英] 迈克尔·曼 著

Michael Mann

陈海宏 等译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二卷·上)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二卷·上)

[英] 迈克尔·曼 著 陈海宏 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人类社会权力性质系列研究的第二卷。迈克尔·曼分析了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权力关系的历史。他主要关注于法国、英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的发展。根据这些细致的帝国研究，作者提出了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兴起、阶级冲突、现代国家和现代军国主义的新理论。

作者简介：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第二卷）、《不连贯的帝国》、《法西斯主义者》、《民主的阴暗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 第一章 导论/1
- 第二章 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关系/26
- 第三章 一种现代国家理论/50
- 第四章 英国工业革命和旧的资本主义政权, 1760—1880年/108
- 第五章 美国革命和联邦自由资本主义的确立/156
- 第六章 法国革命和资产阶级国家/186
- 第七章 四至六章的总结: 阶级和国家的出现/234
- 第八章 地缘政治与国际资本主义/277
- 第九章 围绕德国的斗争(一): 普鲁士与集权民族资本主义/324
- 第十章 围绕德国的斗争(二): 奥地利与邦联代议制/361

第一章

导 论

这一卷继续论述权力历史，时间跨度是“漫长的19世纪”，即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论述重点是具有权力优势(the leading edge of power)的五个西方国家：法国、大不列颠^[1]、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普鲁士—德国以及美国。我的基本理论依然不变。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从根本上决定了各个社会的结构。我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依然是：这四种权力来源的关系是什么？是否其中有一种或几种在构筑一个社会时是最根本的？

那些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对此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明确而肯定。他们断言，归根结底，经济关系构筑了人类社会。韦伯的回答则更多地带有否定性。他说，对于他所谓的各种“社会行动结构”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作出“任何重大的一般概括”。我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但是我能改变韦伯主义的悲观主义吗？

在这方面，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我希望读者耐心地往下读，先听我报告好消息。本卷书将提出三个关于首要性的一般概括。在此，我先来个开门见山，一一列出，容后在其他章节里再补充各种细节，作出各种限定。

1. 在18世纪，经济和军事这两种社会权力来源在决定西方社会结构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到1800年，“军事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这两个事件改造了西方。前者提供的主要是“威权型”权力，后者提供

的主要是“弥散型”权力。由于它们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因此无法说哪一种具有终极首要性。

2. 但是，进入19世纪后，由于军事权力被纳入“现代国家”，还由于资本主义对经济进一步进行了根本改造，经济和政治权力来源开始占上风。资本主义及其阶级关系以及国家和民族，变成现代的主要权力运作者。资本主义及其阶级关系依然表现为相对弥散和含混的状态，而国家和民族则成为威权式解决这种含混状态的主要手段。同样地，由于它们也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也无法说哪一种具有终极首要性。

3. 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处于衰落状态，其重要性也降低了。中世纪欧洲主要是由基督教结合起来的(见第一卷)；1760年，教会依然(正在)改造着论述沟通(*discursive communication*)的手段。然而，在这一时期后期，尽管教会维持了许多权力，读写能力也还有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能与以前相提并论的意识形态权力运动。最重要的现代意识形态所关注的是阶级和民族。从我们后面将要解释的一个特征看，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权力(除了在罕见的革命时刻；见第六、七章)更具有“内在性”而非“超越性”，并且促成了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集体运作者——军国主义和国家的出现。

现在再来看坏消息，更确切地说是使问题变得复杂的消息。但是，根据这些坏消息，我们可以构筑一种更丰富的理论，借以考察实际人类社会的复杂构成因素。

1. 四种权力来源与台球不同。每个台球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彼此相撞时会改变方向。这些权力来源是“交织”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们的互动不仅会改变它们的外在运行轨迹，而且也会改变彼此的内部形状。这里所讨论的事件——法国革命、英国霸权、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兴起、中产阶级政治或农民政治、战争的原因与后果等等——都涉及到不只一种权力来源的发展。我反对“纯粹”的单一原因理论。一般概括不能上升为一个关于“终极首要性”的简单陈述。前面提出的三个陈述可以成为粗略的和“不纯粹”的一般概括，但绝不

是历史法则。

2. 我提出的这些粗略的和纯粹的一般概括，也没有区分帕森斯提出的个别权力和集体权力(Parsons, 1960, pp.199—225)，但是它们的历史发展是分道扬镳的。个别权力(distributive power)是运作者 A 支配运作者 B 的权力。如果 B 获得更多的个别权力，那么 A 必然丧失某些权力。集体权力(collective power)则是角色 A 和 B 的联合权力，他们合作开发自然或剥削另一个运作者 C。在这一时期，西方的集体权力急剧增长：商业资本主义和继之而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军事革命加强了西方列强的实力；现代国家促成了一种新的集体权力运作者——民族——的出现。尽管社会权力的其他来源也对此推波助澜，但集体权力的这三场“革命”主要(分别)是由经济权力关系、军事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力关系导致的(意识形态权力的“革命”——话语能力(discursive literacy)的扩张——则不那么“纯粹”)。个别权力变迁则更复杂、更“不纯粹”。随着“政党民主制”开始取代君主制，各个国家集体权力的日益增强实际上削弱了政治精英支配臣民的种种权力。一般说来，军事精英和意识形态精英也未能增强他们支配其他人的个别权力。但是，出现了两种重要的不纯粹的个别权力运作者，即阶级和民族。它们的出现最初是对军事和经济权力关系的回应，然后则被政治和经济权力关系加以制度化了。它们的复杂历史不是一两句话所能概括的。

3. 阶级和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出现就交织在一起，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通常，人们把它们分开考虑，视为相互对立的東西：资本主义和阶级划归“经济”领域，民族国家划归“政治”领域；阶级是“激进”的，而且通常是“超越民族”的，民族则是“保守”的，会削弱阶级的力量。但它们实际上是同时兴起的，而这就引出了一个进一步需要解决的终极首要性问题：社会生活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围绕着弥散的、市场的、跨民族的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组织起来，或者围绕着威权的、领土的、民族的和国家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社会组织应该是跨民族

的，还是民族的或民族主义的？国家应该具有较弱的权威还是较强的权威，应该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市场应该是放任自流，还是应该受到有选择的保护，或是受到强硬的管制？地缘政治应该是和平相处，还是兵戎相见？到1914年为止，人们无法作出任何简单的选择——而且迄今也没有作出选择。这些考虑至今依然是现代文明的重重大两难问题。

4. 通观西方文明的历史，阶级和民族国家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宗派的”和“部门的”运作者(阶级的竞争对手)以及跨民族的和“区域性”的运作者(民族的竞争对手)历时不衰。我把这样一些组织视为部门权力组织，如著名政党、贵族世系、军事指挥体制以及内部劳动市场等。我把这样一些社会运动视为旨在取代全国性组织的、基本上带有区域性色彩的社会运动，如少数派教会(以及某些多数派教会)、手工业行会以及脱离主义运动。它们都损害了阶级和民族国家的构成，削弱了后者的权力，破坏了后者的纯粹性。

5. 社会权力来源之间、集体权力运作者与个别权力运作者之间、市场与领土之间、阶级、民族和地方性的、部门性的、跨民族的和区域性的组织之间的这些互动关系产生出一种全面的复杂性，往往使同时代人很难理解。它们的行动也因而带有许多错误、明显的偶然性以及意外的后果。这些情况也会反过来改变市场、阶级、民族、宗教等等的结构。我试图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错误、偶然性和意外后果，但是它们显然也是错综复杂的。

因此，这一卷将广泛地展开讨论前述三个粗略而不纯粹的概括，同时也考虑这五种复杂情况。

在这一章和下一章里，我将讨论社会学理论。接下来是五组叙述章节。第四、七章论述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其中涉及四种权力来源的转型。有两种转型早已开始——资本主义和军事革命，但是它们在18世纪促成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转型，尽管后两者各有相对独立的逻辑——话语能力的兴起和现代国家的兴起。我认为这四种革

命都是极其重要的。从波士顿茶会(Boston Tea Party)到大改革法令(Great Reform Act),从珍妮纺织机到史蒂文森(George Stephenson)的火车头,从网球场宣誓到卡尔斯巴德法令(Karlsbad Decrees),从瓦尔密战场到滑铁卢战场,所有这些事件都不是纯粹的,而是包含着四种权力革命的各种组合,并且往往是以人们无法控制的复杂形式,席卷着阶级、民族及其竞争对手。在第七章,我将对这一时期早期阶段的权力发展情况作一总结,并强调军事国家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根本作用。

第九章和第十章着重考察普鲁士和奥地利逐鹿中欧的斗争,以及阶级和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的发展。这两章将解释更为集权的民族国家为何最终战胜了更为分权的联邦体制。第十章的结论将总结这两章的论点,并讨论中欧的解决方式是否普遍适用于整个西方文明。

第十一、十四章分析现代国家的兴起。我展示了五个国家的财政和官员的统计数字。另外,我把国家成长分解成四个不同的进程:规模、范围、代议制和官僚机构。迄1815年为止,国家规模的巨大增长是由军事发展引导的,同时使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化了。这也培育了广泛性(extensive)和政治性的阶级和民族,损害了区域性和跨民族的运作者。与一般看法相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多数国家并没有继续成长。但是,1850年以后,主要为了回应工业资本主义,各个国家都极大地扩展了它们的民事干预范围,由此相当意外地整合了民族国家,培育了民族性的阶级,削弱了跨民族的和区域性的权力运作者。

大多数关于现代国家的功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韦伯主义理论都强调国家的规模、范围、效率和同质性的发展。但是,随着各个国家的成长以及接踵而至的多样化发展,它们的两个新兴的控制机制——代议制和官僚制——也竭力同步发展。代议制的冲突集中于哪些阶级、哪些宗教和语言团体应该有代表权,应该在什么方面得以体现;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如何集中权力,如何成为全国性?尽管许多理论对“什么人”作了阐述,但是没有涉及“在什么方面”。诚然,关

于美国的国家权利和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奥地利的诸多民族有许多经验研究。但是中央集权国家和区域性权力运作者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很普遍的，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一直是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在这一时期这两个问题都未得到解决，因此随着国家的成长，国家就变得不那么完整一致了。最明显的证据是，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脱节：阶级越来越纠缠于国内政治，而政治和军事精英则垄断着对外政策。马克思主义、精英理论和多元理论都过分地把国家视为首尾一致的整体。我用第三章提出的“多形”(polymorphous)理论来证明，现代国家往往混杂地“定型”为四种主要形式——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军国主义国家的，并以不同的方式解决代议制问题和民族问题。第十四章的结论对我关于现代国家的兴起的理论做了总结。

第四部分即第十五、二十章，考察中下层阶级的阶级运动以及1870年以后大众性民族的兴起。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同时而含混地造就了阶级和地方性、部门性组织。我把这些后果主要归因于威权性权力关系。第十五章讨论19世纪初期英国的“第一个工人阶级”。第十六章考察中产阶级的三个阶层——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员(professionals)和流动职业者(carcerists)以及他们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关系。第十七、十八章描述阶级、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三方面对工人的精神争夺。这种争夺最终因各种现代国家的定型而武断地解决。第十九章分析“生产阶级”、“信贷阶级”(credit classes)和“局部部门”对农民的精神争夺以及相似的结果。第二十章对全部有关论述作一概括，并对整个“漫长的19世纪”的各种社会权力来源之间的关系作一总结。

第七章、第十章的结论、第十一章的结论、第十四章的结论和第二十章提炼出这一卷的结论。但是，关于这一时期还有另一个极其经验的结论。西方社会断然地投入历史上最残酷的冲突——世界大战。前一个世纪也是以一系列残酷战争——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告终的。第八章和第二十一章讨论了这些结局。第二十一章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也是我的一般理论的最后一个经验例证。这一章驳

斥了各种主要以地缘政治或阶级关系为中心的解释。这二者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的行动在客观上是非理性的，而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人们会认识到这一点。阶级、民族及其竞争对手的交错缠绕，导致了意外的国内后果和地缘政治后果的恶性循环，情况极其复杂，以至于参与者无法完全理解，多形国家无法加以控制。因此，我们应该从这种堕落中吸取教训，对权力实行制度化，以免重蹈覆辙。

这一章的余下部分和接下来的两章将进一步解释我的 IEMP 权力模式。我再次重复我在第一卷开始时对读者的忠告：如果你觉得社会学理论晦涩难懂，那么可以直接跳到第一个叙述章节，即第四章。稍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过头来读理论部分。

IEMP 权力组织模式

我们先来考察决定着社会整体结构的权力组织。这些权力组织有三个形式特征和四种基质。

1. 如前所述，组织包含着集体权力和个别权力。大多数实际的权力关系——例如阶级之间或国家与其臣民之间——都以各种不同的组合形式包含着这两种权力。

2. 权力可能是广泛性的，也可能是深入性的(intensive)。广泛性权力能够把广阔领土上的大量人员组织起来。深入性权力能够动员其参与者的高度献身精神。

3. 权力可能是威权性的，也可能是弥散性的。威权性权力包含着由一个运作者(通常是一个集体)意志命令和部下的自觉服从。在军事和政治权力组织中可以找到最典型的例子。弥散性权力不直接由命令实施。它是以相对自发的、不自觉的和无中心的方式扩散的。人们会被迫以明确的方式投入行动，但不是由于某个人或组织的命令。弥散性权力最典型地体现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权力组织中。一个典型例子是

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这里包含着相当程度的强制,但这种强制是非人格化的,表面上往往是“自然”的。

最有效的权力运作是把集体权力和个别权力、广泛性权力和深入性权力、威权性权力和弥散性权力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单一的权力来源——例如经济或军事——很少能凭自身决定整个社会结构。它必须与其他权力资源结合起来,例如我在这一时期所确定的两组笼罩性的二元决定因素。实际上,社会权力有四种重要来源: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

1. 意识形态权力源出于人类对寻求生活终极意义、共享规范和价值、参与审美实践和仪式活动的需求。如果控制了一种兼有终极意义、价值观、规范、审美和仪式的意识形态,就能造成普遍性的社会权力。在第一卷里,宗教提供了这方面的大多数例子。在这一卷里,宗教与世俗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交相辉映。它们都越来越重视阶级和民族的意义。

每一种权力来源都造就出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意识形态权力主要是弥散性的,是通过说服、“真理”声称和参与仪式“自由”来行使支配权。它主要有两种弥散方式。首先,它可以是“超越”社会空间的。也就是说,一种意识形态可以穿越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组织的边界四处弥散。属于不同国家、阶级等等的人会面临相似的问题,而一种意识形态能够为之提供似乎合理的解决方案。这样,意识形态权力就能超越性地扩散,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独特的和强大的社会互动网络。其次,意识形态权力能够强化现有的权力组织,促进其“内在士气”。超越性是一种基本独立的权力形式;内在性则能复制和加强现有的权力关系。

2. 经济权力源出于人类榨取、改造、分配和消费自然资源的需求。它是一种特别强大的权力,因为它把深入的日常劳动合作同广泛的物品分配、交换和消费环网结合在一起。这就提供了一种稳定混合体,兼有深入性和广泛性的权力,通常还兼有威权性和弥散性权力(前一种权

力是以生产为中心，后一种是以交换为中心)。第一卷把这种经济权力组织称作“实践环网”(circuits of praxis)，但是这一术语过于晦涩。我现在抛弃了这一术语，而使用更常见的标签来表示这几卷所讨论的经济合作与冲突的形式：阶级和地方性、部门性经济组织。

任何复杂社会都是对经济资源实行不均等的控制，因此，阶级就无所不在了。马克思在拥有或掌握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人与只能控制自己劳动的人之间作了最基本的区分。我们显然可以更进一步，更细致地区分拥有更特殊的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利的阶级。这种阶级可以分成更小的局部的运作者，如熟练工人工会或某一行业。阶级之间有一种上下联系——A 阶级高于 B 阶级。但是在横向上也有另外的集团冲突。仿照人类学的术语，我把这种集团称为“部门”*[2]。与部落、世系、庇护网络、乡土关系、工业企业等等一样，一个部门集团的成员可以来自不同的阶级。不同部门在横向上彼此竞争。在人类社会中，阶级、地区和部门相互交错，相互削弱。

我在第一卷里证明，当时部门和地区通常是压倒了阶级。阶级一般仅仅是“潜在”的：主人、劳动者和其他人相互之间展开斗争，但通常是半隐蔽的，深入性的，局限于日常生活和地区层次。大多数广泛性斗争发生在部门之间。但是，当阶级关系逐渐占了上风时，我们就进入第二阶段，即出现“广泛性”阶级。阶级关系有时是“对称”的，有时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广泛性阶级通常首先出现：唯有有产者广泛地组织起来，而劳动者则局限于地区性和部门性组织。然后，在对称的广泛性阶级结构里，两大阶级都在相似的社会空间范围组织起来。最后，我们看到组织起来控制国家的“政治阶级”。在此，我们依然可以区分出对称的和不对称的阶级结构(后者是指唯有有产者在政治上组织起来)。马克思在其洋洋得意的时候声称，政治性的、对称的、广泛性的阶级以及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正如第一卷

* segments, 人类学中指部落中的氏族, 但在这里似乎应译成“部门”。——译者注